

中国社会学史的新探索

魏厚宾

【摘要】基于几代社会学人的反思，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学不应归结为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社会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学科，以先秦荀子创立的群学为根基，在中国发展延绵了两千多年。我们可以将西方社会学传入之前的群学视为中国古典社会学，将传入之后的社会学视为近现代中国社会学，这一全新的中国社会学观念由景天魁及其主持撰写的《中国社会学史》所确立。与以往社会学史的写作不同，景天魁版的《中国社会学史》从中国固有的文化资源和学术传统出发，探索出命题式写作范式，使群学成为中国社会学一以贯之的宗旨。这一社会学史观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开辟了社会学研究、社会学本土化的新境界，树立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为走出中国当下的社会学困境探索了出路，为中西社会学对等交流和相互会通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史 群学 学科体系 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魏厚宾，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3)02-0062-17

长期以来，社会学界都将群学当作（西方）社会学的早期译名。但梳理群学的历史会发现，群学不是因为西方社会学才出现的，而是在社会学传入中国以前就已经产生，这就导致社会学界关于中国社会学的起点和上限的争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韩明谟与陈树德就中国社会学的起点和上限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辩。陈树德在其文章中一再强调只有“货真价实的西方社会学”才称得上是中国社会学的起点，才能作为中国社会学历史的上限。^①韩明谟则

^① 参见陈树德：《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反思》，《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第6页。

针锋相对，反问“为什么一定要货真价实的西方社会学才能算是中国社会学的起点、上限呢？而中国人自己讲的就不能列为上限吗？”，并认为中国社会学史的起点是康有为在长兴学舍所讲授的群学。^①因此韩明谟在写中国社会学史的时候，特地将中国社会学的发轫时段置于1891年到1910年。从二位的论辩中，我们不难看到两种社会学观念：一种认为中国本没有社会学，社会学是舶来品，中国社会学就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另一种则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社会学，就是在西方社会学还没有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群学。不过韩明谟认为群学只能追溯到康有为。在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西方社会学”依然占据重要位置^②的背景下，能够得出这样的认知，十分难能可贵。其实我们只要沿着群学继续往前追溯，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学远在康有为之前便已出现，完全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荀子。这一社会学观念，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由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费孝通承继并念念不忘，最终在景天魁这里得到论证、建构、完善，形成新的中国社会学观念及《中国社会学史》。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学界“公认的社会学理论即是国外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基本被嵌套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二元分割上”。^③这种割裂说明，中国需要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中总结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才能合理解释中国的社会发展。正是基于这样被动的社会学学科现状，我们国家在呼吁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强调中国学界应当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研究，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形成我们自己在社会科学上的特色和优势。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以景天魁为首的一批中国社会学人，通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思和重新定义“中国社会学”。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学史》，就是在树立我们的学科自信、发掘我们的历史自信、筑基我们的文化自信。

一、中国社会学史论的突破

社会学自改革开放起开始重建，重建时的社会学由于急于出成果，所以走了一条照搬西方社会学的“捷径”，诚然这对于我们迅速建立起自己学科

① 参见韩明谟：《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时限、分期及传统问题——与陈树德同志商榷》，《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1期，第22~23页。

② 参见尉建文、柴玲、侯佳伟：《〈社会学研究〉与中国社会学（1986—2015）》，《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101页。

③ 夏当英：《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价值自觉——“中国社会学史”教学反思》，《教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43页。

的“五脏六腑”十分有效，但是也不可避免地给之后的社会学发展上了一道“中国没有社会学”的“紧箍咒”：^①社会学的基本定义、理论、方法论、研究传统等几乎全部的学科框架，都来自西方，尤其来自欧洲和美国。^②也就是说，“西方传统被看成参照物而其他传统被视为需要加以特殊说明和修正的‘偏差’”。^③所以，在中国社会学重建4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只是步西方社会学的后尘，并没有发展出能够与西方社会学相比肩的理论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学在当下面临的困境。在这样的困境中产生了一批强调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建立中国社会学的社会学人，如以翟学伟为代表的对孝道、人情、关系、缘、面子等中国人特有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现象的研究，以王春光、贺雪峰为代表的对三农问题进行研究的“新乡土派”，以陈文江为代表的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西部社会学”，以应星、周飞舟为代表的对“气”“礼”等中国独特的社会行动概念的研究，以及以景天魁为代表的对基于中国思想文化而产生的群学的研究。他们这些研究都在试图突破西方社会学的藩篱，建构基于中国本土经验和中国历史文化的知识系统与理论解释体系，以期实现理论替代型和“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④的社会学本土化。与其他几位社会学人主攻中国文化中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不一样，景天魁则以其气魄和胆识在社会学史论中高呼“社会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学科”，将社会学追溯至先秦的荀子，并付诸行动通过重写《中国社会学史》建构起一套以群学为核心的中国社会学元理论，可以说这既是对中国社会学界振聋发聩的呐喊，又是对中国社会学所面临困境的超越。

严复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翻译为《群学肄言》，就名称来看，便是将“群学”等同于“社会学”：“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⑤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同样，群学的功用也就是社会学的功用：“群学者，将以

① 参见林南：《中国研究如何为社会学理论做贡献》，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参见孙飞宇：《中国社会学的“中”与“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57页。

③ 林南：《中国研究如何为社会学理论做贡献》，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④ 参见谢立中：《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类型——以费孝通先生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42页。

⑤ 严复：《译〈群学肄言〉序》，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页。

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者（指正德、利用、厚生）之事操其本耳。”^①正德是正民之德，属于政治文化层面；利用是利民之用，属于经济层面；厚生是厚民之生，属于民生层面。群学是揭示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及把握正德、利用、厚生三个方面根本的学问。这样的解释，既符合孔德、斯宾塞等西方社会学家以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也完全考虑到了中国本土所具有的独特思想传统。严复将“群学”等同于“社会学”，开启了中西社会学会通的先河，其群学思想便是来自中国战国时期的荀子。荀子强调“人之生，不能无群”，^②人与牛马等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③并因此确立了使“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④的“群道”，这种对“群”的肯定与强调，正说明荀子是以“社会”（群生）为对象进行思考的。“就理论本身而言，我们必须承认，事实上并没有某种界限分明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也不存在某种唯一的社会学理论传统。”^⑤景天魁从荀子的“群道”中提炼出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这四个核心概念，并将之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应起来，形成群学的元理论，这一元理论不仅统摄中国古典社会学的命题体系，还贯彻中国古典社会始终，从而将群学这一既古又新的中国社会学观念确立下来。

费孝通曾在多种场合提到拉德克利夫·布朗于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讲学时提出的社会学论断：“社会学的老祖应当是中国的荀子”，“中国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这门学科”。^⑥这印证了严复、梁启超等人对中国本有社会学的论断，也说明荀子的群学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源头。因此费孝通从社会学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和重新审视，并对社会学做出新的判断：“实际我们中国历代思想家思考的中心一直没有离开过人群中的道义关系。”^⑦“道义”就在人群之中，这不仅说明道义在群学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说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中国文化是一种具有整合性和凝聚力的文化。与道义相承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这

① 严复：《译〈群学肄言〉序》，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页。

② 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2页。

③ 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9页。

④ 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0页。

⑤ 孙飞宇：《中国社会学的“中”与“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59页。

⑥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348页。

⑦ 费孝通：《略谈中国的社会学》，《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第2页。

才是真正的“文化自觉”。^① 天下与己的关系就是群己关系，家国同构、天下一体，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正是这种文化的不同，导致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的表现形式和形态有很大不同。景天魁在其中国社会学史论中特别揭示出荀子在“群己关系、家国关系、治理问题、变易问题、制衡问题、天下问题”上的探讨，许多概念和命题的社会学特质已经具备，与西方的经典社会学家孔德、斯宾塞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理论更为丰富”，只不过“表现形态多为论辩式，而非陈述式；表述形式上更为实用化，非纯学理化而已”。^② 中西社会学关注的问题是一致的，只不过表现形态和表达方式不同，不能因此而否定学科内涵的相同。中国的社会学早在荀子时期就已经成形，这本身是一种历史事实，只不过其名为群学。

如果在社会科学得到极大发展的今日中国，我们还“相信只有一种社会学及其研究方法，即科学化的研究方法与职业化的社会学，那就会遗失社会学最为实质的内涵”。^③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逻辑，景天魁确认“群学就是中国形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④ 他将中国社会学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国古典社会学，即由荀子创立并绵延了两千多年的群学；一种是从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到今天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学。近现代中国社会学与中国古典社会学相比，成分变得复杂了，“不仅包括来自中国本土的群学和来自西方的社会学，也包括在中西社会学会通和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理论、新学派，还包括110多年来在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基础上提炼形成的社会学新概念、新命题和新理论”。^⑤ 也就是说，中国古典社会学（群学）也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当今中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观点——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上述关于“群”或“社会”的思想、学说只能称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而不能称为“中国本土社会学”^⑥——完全相反，严复、梁启超等对

① 参见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4期，第143页。

② 参见景天魁：《论群学复兴——从严复“心结”说起》，《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5期，第8页。

③ 孙飞宇：《中国社会学的“中”与“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62页。

④ 景天魁：《欲兴其学 先正其史——略谈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人文杂志》2019年第6期，第4页。

⑤ 景天魁：《欲兴其学 先正其史——略谈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人文杂志》2019年第6期，第3~4页。

⑥ 参见谢立中：《“群学”的归属：“社会思想”还是“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18日。

近现代中国社会学的阐发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就中国古典社会学来说，群学与社会学是等同的；就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来说，群学与社会学有相同也有不同。景天魁在说明群学与社会学不同时，将群学的特点总结为：“群既是研究对象，又是行动主体；群学既有理论性的一维，又有实践性的一维；既有明晰的结构，又有强大的功能，而且理论性与实践性、结构与功能是高度统一的。”^① 而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精神和精髓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并不相悖。职是之故，群学与社会学在内容上二者“正同”（梁启超语）；在方法上，二者“暗合”（严复语）；在形式上，二者则又“相异”。^② 群学与社会学有相同有不同，在内容上是同大于异，在形式上是异大于同，在方法上则主要表现为相异。可以看到，社会学和群学是从各自环境，即孕育二者的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二者的不同是由各自历史和文明的选择所决定的，但是二者在根本上是一样的。谢立中曾专门撰文对“社会学”之“学”的内涵进行阐发，表达了对景天魁提出的新型社会学观念的期待：除了西方人提出的这三种“科学”思维模式，^③ 以我们悠久的中华文化资源为基础，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或多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科学”模式？^④ 所谓中国文化特色的“科学”模式，就是在说明西方社会学并非唯一的学科标准。

针对孔德提出的社会学，景天魁有过专门辩驳：如果将其看作“唯一公认的名称”“唯一的标准”，那我们干脆“连异同也不用讨论了”。^⑤ 这种唯一性，是独占和排他式的霸权，完全排除了学科产生的多源性。因此，景天魁极力反对把西方社会学等同于社会学，反对把西方社会学看作“公认理论”，认为这种观念不仅是对社会学的掩盖，还是对中国社会学的消解，这种掩盖和消解否定了中国古代本有的社会学，是对社会学的垄断。^⑥ 而对中国社会学史的重新书写就是要打破这种垄断，去掉这个加在我们头上百年的“紧箍咒”，为当下中国社会学的困境探索新的出路。

① 景天魁：《论群学元典——探寻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第一个版本》，《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6期，第40页。

② 参见景天魁：《欲兴其学 先正其史——略谈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人文杂志》2019年第6期，第3页。

③ 指孔德提出的“实证科学”概念、狄尔泰等人提出的“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概念、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辩证科学”概念。

④ 参见谢立中：《“群学”的归属：“社会思想”还是“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18日。

⑤ 参见景天魁：《欲兴其学 先正其史——略谈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人文杂志》2019年第6期，第3页。

⑥ 参见景天魁：《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概念的提出、含义与实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59页。

二、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确立

中国社会学要想与西方社会学进行对等交流，首先是个主体性问题，而绝不是方法论问题，因为“尽管社会学的发展在中国已逾百年，重建也有40年的历史，但其鲜明的西方化倾向，或者说由‘追随者’的地位导致的主体性的缺乏，却是一个公认的事实”。^①金耀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过社会学中国化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即要赋予社会学以特殊的中国性格；二是指使社会学充分地在中国发展，使它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在中国生根。”^②使社会学在中国生根、形成社会学的中国性格，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求中国社会学确立自己的主体性。试想，没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学会不会有中国性格吗？我们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学永远只能是从属与模仿，中国性格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更何谈走出当下的中国社会学困境？所以，社会学的主体性要求我们确立社会学的中国根基，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经验中总结出我们的社会学特色、特质。景天魁通过一系列社会学史论和对《中国社会学史》六卷本的组织书写及陆续出版，说明了社会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学科，从而确立了以群学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

事实上，并非只有西方学术分学科，中国古代也分学科，不过分法不同而已。景天魁指出：“大体上说，西方是学科之内分学派，中国古代却是学派之内分学科。”^③如先秦的学派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儒家的孔子之学就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分别是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书法、术数；墨家学派则分为谈辩、说书、从事三大科，三大科中又可以区分出许多细分的科目，就“从事”一科来说，其中就有农、工、商、兵等细分的“专科”。可见，知识学术体系的不同导致中西文化各自在学科分法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又有很多相通、一致之处。中西方的学科“不同分法各有优长，但要相互承认，不能只说西方有学科，中国就没有学科”。^④孙飞宇在对中国社会学的“中”与“西”进行思考时，便说过：

① 周晓虹：《社会学本土化：狭义或广义，伪问题或真现实——兼与谢宇和翟学伟两位教授商榷》，《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21页。

② 中国社会学会：《台湾学者谈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社会》1982年第1期，第45页。

③ 景天魁：《论群学元典——探寻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第一个版本》，《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6期，第46页。

④ 景天魁：《论群学元典——探寻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第一个版本》，《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6期，第46页。

“没有西学，我们的想象力会变得极为贫瘠，而如果只有西学，甚或至于只有西学中最形式化的那部分，那也就不存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了。”^① 这正是确立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必要性所在。

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以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刘师培等都肯定群学与社会学是同一个学科。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就将“群学”作为学科纳入教学大纲。严复将“sociology”译为“群学”，这本身就是在确认群学是学科，而不只是“社会思想”。他曾踌躇旬月，才找到“群学”这个词汇，说明严复将社会学之名翻译为“群学”，不仅仅是因为找到了“群”这个贴切的词，更在于他肯定了“群学”这一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科的存在。荀子以“群”为核心概念，构建了中国社会学的原初体系。严复强调：“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兴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② 群学开辟出的“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由治国而平天下”的社会进路，与西方社会学所强调的“由个人而社会、由分层而结构、由组织而制度”的社会层次，具有异曲同工之处。^③ 严复将社会学作为教育的基础课程，正是因为社会学的社会功用与群学在中国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从日本翻译了《社会学》一书的章太炎，也高度称赞荀子的群学，实际上就是将群学视为中国自古就有的社会学科。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空前繁荣，梁启超称之为中国学术的“全盛时代”，而荀子生活的战国后期则是“全盛中之全盛”。梁启超盛赞荀子所创立的群学，称荀子是“社会学之巨擘”。因为受到严复《天演论》和谭嗣同“仁学”的影响，梁启超在《说群序》中，曾立下要“发明群义”的宏愿——“理奥例蹟，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释然有当于其心”，于是计划“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④ 虽然“作《说群》十篇”的宏愿没有完成，但是在将群学视为中国社会学这一点上，梁启超与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的观点是一致的：群学就是中国的社会学。^⑤

到20世纪30年代，刘师培就西方近代学科划分问题专门指出，我们可以从“周末”，即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中划分出心理学、伦理学、政

① 孙飞宇：《中国社会学的“中”与“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62页。

② 严复：《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页。

③ 参见景天魁《论群学复兴——从严复“心结”说起》，《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5期，第9页。

④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37页。

⑤ 参见景天魁：《欲兴其学 先正其史——略谈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人文杂志》2019年第6期，第4页。

法学、会计学（经济学）、教育学等16个学科，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社会学”。^①可见，即使用近现代西方的学科划分标准来看待中国的先秦学术，依然能够从中区分出这么多学科。也就是说，这些学科在中国是本来就具有的，只不过没有所谓的专业式划分，当西方学科传进来之后，我们即使以其为标准，依然能够迅速从中国的传统学术中发现这些学科的存在。社会学就是这样的学科，是中国文化中本来就具有的。

确认社会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学科，不仅是在接续中国的学术传统，还是在确立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同时也是对什么才是“社会学本土化”的回应。“如果我们从广义上来界定社会学本土化，就等于说只要处于中国背景下的社会学历史进程及其一些重要社会学家的努力都可视为本土化”，^②这诚然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一种表现，但是这种对本土化在广义上的解读，并不能赋予社会学的中国性格。而要赋予社会学的中国性格，就要确立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确立要求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建立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当前，一批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学概念如人情、面子和关系等在社会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关系（guanxi）成为过去三十年有关中国情境的论文贡献的三个新概念之一。^③但是这些文章的落脚点主要是在“概念间关系的解释逻辑方面，并没有发展出真正中国本土的理论体系，只是贡献了儒家思想中的一些概念（如面子、人情、仁、报等）而已”。^④景天魁及其团队通过《中国社会学史》确立的群学则对本土文化进行了理论上的系统化阐发，可以说是对西方社会学及其学科评价标准的突破和超越。

如果将西方学科视为唯一性标准，那我们中国五千年的学术，不仅不能有社会学，几乎什么学科也不会有。在近代，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直到21世纪初，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在访问中国时还说“在现代以前，中国有思想，没有哲学”，^⑤这激起了中国哲学界的坚决驳斥，因为中国自先秦开启的哲学传统已经深入人心，得到普遍公认。

① 参见李妙根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89页。

② 翟学伟：《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对周晓虹教授的几点回应》，《开放时代》2020年第5期，第181页。

③ 另外两个是市场转型（market transition）和网络资本主义（network capitalism），参见翟学伟：《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对周晓虹教授的几点回应》，《开放时代》2020年第5期，第129页。

④ 翟学伟：《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对周晓虹教授的几点回应》，《开放时代》2020年第5期，第129页。

⑤ 转引自庄国欧：《抵抗解构：解读德里达和王元化的对话》，《东方丛刊》2006年第1期，第164页。

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中对中西哲学的异同有着明确认知：“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①并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中西哲学的衡量标准有问题：“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标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②我们现在谈论“中国是否有哲学”实在是因为西方文化居于强势地位，这种观点和态度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学，这与景天魁对“中国社会学”的判定基本吻合。目前，中国社会学也同样面临古今之辩、中西之争的问题。不能因为西方有“社会学”之名，而否定中国有社会学（群学）之实。我们同样可以说，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相同，但是在问题与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方社会学颇为相当。所以，不能因为二者形式的不同，就认为西方的社会学才是社会学，中国的社会学只是思想，那未免有些妄自菲薄了。中西文化是由两个文明形态衍化而来的，本无优劣之分，不能因为近代以来暂时的落后就否定中国在整个人类历史文化中的贡献和自成体系的学术传统。

近代以来，中国在文化上遭受到了重创，西方文化乘着工业革命的列车快速席卷世界成为主流，形成压倒性优势，从而使中国文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否定，这种否定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大量照搬西方文化。这种短时间内大量借鉴西方文化的情况，虽然在中国现代学术学科的发展中起到了促进、推动作用，但这“显然也是功利性的借鉴，是缺乏坚实基础、缺乏人文反思以及全局观的借鉴”。^③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我们国家走向了繁荣富强，重新找到了根，树立了文化自信。从景天魁及其社会学史论中的观点出发，我们不能因为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就不敢确立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确认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只有确立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筑建中国社会学历史根基，明了何为中国社会学，才能更好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也才能为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打下坚实基础。

三、中国社会学史的探索与创建

确立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肯定群学是中国古典社会学——由此社会学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②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8页。

^③ 刘亚秋：《从中西学关系看费孝通“扩展学科界限”思想》，《新视野》2015年第2期，第122页。

史观出发，自然需要重新撰写中国社会学史。在景天魁的主持带领下，从群学社会学史观出发，景天魁团队已经完成的《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与《中国社会学史》第一、二卷，便是用实实在在的成果确立了群学这一虽然古已有之，但能够刷新中国社会学学界认知的新观念。

在此之前，以《中国社会学史》命名的著作有四本，一本为韩明谟所著，一本为杨雅彬所著，这两部作品均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是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所著，其写作都是以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社会学为主的。就起止时间来说，韩著的内容起于1891年止于1985年，旨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学的发生、发展史并吸收其营养和教训，以使社会学这门学科更加迅速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杨著的内容起于1895年止于1949年，其研究目的在于通过探索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尽快给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还有一本是郑杭生、李迎生在总结韩、杨基础上写作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采取社会运行论和社会学两大新视角，从“学派”角度对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次新的整理和概括，其内容起于1903年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止于2000年，是目前“中国社会学史”课程教学中的通用教材。另一本则由阎明写于2010年，在《中国社会学史》下面还有一个副标题：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这本社会学史实际上脱胎于作者在2004年出版的《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一书，再版时才将名字改为《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其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者，因此时间上的起止主要在1903年到1979年。

反观这四部《中国社会学史》，无一例外都是将近代，确切地说是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这一时段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开端。但是其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如在社会学的起止断代上，韩著起于1891年，杨著起于1895年，郑、李著及阎著则起于1903年，这反映了他们写中国社会学史时在开端上认知的不同。这种不同说明了韩、杨肯定了中国自有的学术传统，而郑、李及阎则更注重西方的学术传统。陈劲松将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方式总结为两类：一为概述史；二为专门史。^①而上面的四种著作都属于概述史式的研究：韩著属于“典型式”^②的研究；杨著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郑、李著是以“学派”为中心的研究；^③阎著则属于“复合式”

① 参见陈劲松：《共识、分歧与趋势：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三十年》，《河北学刊》2009年第1期，第92页。

② “典型式”是指对典型人物、典型思想的研究。

③ 参见陈劲松：《共识、分歧与趋势：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三十年》，《河北学刊》2009年第1期，第92页。

的研究。^①

相比较而言，景天魁版的《中国社会学史》则有了非常大的突破。首先是在中国社会学史的时段划分上，郑、李及阎著仅仅起自1903年，韩著、杨著虽然有突破，但也只是将社会学的发端时段前推十年左右。毕竟社会学是舶来品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限制了他们只能在近代这个小时段里面推敲，而难以在中国社会学理论和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上取得更大突破。韩、杨二人意识到中国自己的文化资源中有社会学，却没有看到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严复、费孝通为代表的几代人在社会学本土化中的努力。费孝通曾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对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给予超越西方社会学的厚望，景天魁则发掘并确立了群学这一新型的社会学观念，将中国社会学史的历史推至先秦的荀子，并将其与近现代的社会学统合起来，认为西方社会学传入之前的中国社会学可以称为中国古典社会学，即群学，而西方社会学传入之后与群学融合并发展至今的中国社会学则称为近现代中国社会学。当我们把眼光放到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时，中国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便得到了极大拓展，中国社会学的阶段划分也不用再纠结于细枝末叶的几十年。^②有了群学的源头，我们当下的社会学就不再是西方社会学的延续，而是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兼济与融会。故而，景天魁认为近现代中国社会学不仅包括中国本土的群学和西方的社会学，还包括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概念、新命题和新理论。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景天魁版的《中国社会学史》虽然从先秦的荀子开始书写，其落脚点却是当代。西方社会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在根本上的不同导致其理论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当群学作为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融合之后，便具有了既能解释东方又能解释西方的共性。也就是说，融入群学的社会学，是对西方社会学的超越。从中国古典社会学（群学）过渡到近现代中国社会学，再到中国当代社会学这一演变，不仅是对中国社会学内涵的拓展，还是对中国社会学传统界限的扩展；不仅是中国自身学术传统的接续，还是对西方社会学迟来的反思；不仅是在确立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还是在建立我们的文化自信。无论是中国社会学自身发展困境的诉求，还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需求

^① 参见岳天明：《中国社会学史研究40年：历程、共识和展望》，《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23页。

^② 在韩明谟与陈树德长达十年的论战中，有一个焦点便是中国社会学的阶段划分，每一阶段的划分都是一二十年。将五十多年的社会学划分为四五个阶段，这虽然有助于那个时代对社会学的理解，但试想三五百年之后，还能每隔一二十年划分一个阶段吗？那就显得太琐碎了。

要，都在呼唤像景天魁版的《中国社会学史》这样的对中国社会学的新探索。

其次，景天魁版的《中国社会学史》与以往的社会学史的写作范式完全不同，是对社会学史写作范式的创新。以往写作《中国社会学史》的范式如前所述，多是以概述史为主的研究，研究的方式则是“典型”“学派”“人物”“复合”等。而景天魁及其团队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深入思考和对中国学术的深入研究，则独辟蹊径地创造了命题式的社会学史写作方法。命题式社会学史的写作是将群学分为合群、能群、善群、乐群这“四群”，并将之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有的“内圣外王”的思想形态和社会进路相结合，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体系。这套体系以“命题式”为表现形式，而命题的基础是概念。因此，景天魁及其团队从“四群”与“修齐治平”的特性出发，提出了4个基础性概念和30个代表性基本概念。基础性概念即贯穿于群学始终的概念，即“群”“伦”“仁”“中庸”。基本概念则是建构群学基本命题的概念，又以“四群”和“修齐治平”为标准划分为4个模块：第一个模块是合群所对应的修身，其基本概念包括身、己、性、气、心态、社与会、天、自然等；第二个模块是能群所对应的齐家，其基本概念包括家、宗族、孝、礼、义、信、利等；第三个模块是善群所对应的治国，其基本概念包括国与民、国土、士、王道与霸道、贤与能、科举、公与私、秩序、位育等；第四个模块是乐群所对应的平天下，其基本概念包括天下、势、变、和合、多元一体、大同等。基础性概念贯穿于基本概念之中，但又能与基础性概念中的其他概念相结合形成命题，如合群模块中的“己”、能群模块中的“礼”与基础性概念中的“仁”可以组成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命题；再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是“孝”与“仁”的结合。同时，基本命题之间又可以相互结合，形成新的命题，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将合群模块中的“天”、善群模块中的“位育”与乐群模块中的“和”结合形成的命题，“士为知己者死”则是“士”与“己”的结合。除了这两种形态的组合，这些概念本身又能衍化出不同的命题，如“中庸”就可以衍化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等不同命题。这4个模块的30个概念虽然是以现代的学术标准做的提炼与分类，但同时也符合中国文化中对世间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盖统是一太极，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极”的逻辑认知。“道生一，一生二”和“体统是一太极”，可以看作群学及其所提炼的4个基础性概念，“二生三，三生万物”和“一物各具一太极”，则可以看作由群学延伸出的30个代表性基本概念。这些概念从古人的常用命题中统计并提炼出来，是一种经验性的研究。古人的很多命题都是将这些概念组合起来形成的，所以景天魁将这

些概念称为基本概念。

尽管以基本概念形成的命题所进行的研究会让人联想到社会学与哲学等学科的区别，但是我们追溯西方社会学的早期发展会发现，景天魁及其团队的所作所为与西方社会学奠基时期，即古典社会学时期的理论发展具有十分相似的特征。孔德所创立的社会学是从社会哲学发展而来，其后马克思、斯宾塞、齐美尔、韦伯等人的社会学，都具有与其所处时代及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思想相关的背景。西方社会学的古典时期就是在实现由古到今的转变。那种移植嫁接式社会学跃进虽然对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无法改变中国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这一事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社会学史》正在建构中国社会学自己的“古典时期”，努力将中国的古典文化转化为当下的社会学说，努力从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具体而言，景天魁及其团队将群学所确立的4个基础性概念和“四群”所对应模块的基本概念作为中国社会学的源头，从而成就了《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这本奠基性著作，成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根基。“群”、“伦”、“仁”、“中庸”及“四群”所涵盖的基本概念亦可以看作中华文化的核心概念，构成群学的基础概念体系，并贯穿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始终。根据景天魁的阐述，群学的基础概念体系在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中经历了4个阶段，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主题表现：秦汉时期表现为制度化，隋唐宋时期表现为民间化，元明清时期表现为心性化，清末民国时期则表现为深刻的转型。^①不同的主题又由不同的命题组成，虽然每个阶段所呈现出的主题和命题不同，但都贯穿于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中，这些不同的命题最终又都指向这些主题：制度化、民间化、心性化、转型。也就是说，景天魁版的《中国社会学史》不再是像其他版本的《中国社会学史》那样只是随着人物、学派转动而没有一贯的宗旨，而是通过树立贯穿中国社会与历史始终的群学，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

需要说明的是，命题式写作范式虽然是以基本概念为中心展开的，但是完全区别于哲学思辨式的概念阐述，是创造性地以命题的核心思想为主旨，反映所处时代的社会及历史特征。有些命题相似，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内涵和社会风俗、风貌。比如说，同样的概念命题在制度化时期的意义内涵和在民间化时期的意义内涵就会有不一样的表现。从命题的发展中，可以窥见历史社会的变迁。其中既有不变的群学宗旨，又有变化的意义内涵，反映到社会中自然具有不同的现象表现，这是其史学性

^① 参见景天魁：《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概念的提出、含义与实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57页。

的具体体现，也是景天魁版的《中国社会学史》区别于其他社会学史的又一特征。

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确立表明中国社会学不用再仰人鼻息、拾人牙慧，而是可以在与西方社会学平等对话、对等交流中发展演变。这无疑是对我们文化自信建设的践行和巩固。可以说，景天魁确立的群学及其所主持撰写的《中国社会学史》突破了旧有的社会学观念，发展了新的社会史观，书写了新的社会学史，开辟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新境界，是中国社会学基于中国古典文化背景和历史经验进行的大胆且具有创新性的探索。

在景天魁主持撰写《中国社会学史》之前，虽然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已经100多年了，但是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建构还处于翻译引进与研究并重阶段。^① 编撰一套真正属于中国的《中国社会学史》，不仅填补了建构本土社会学理论的空白，还确立了中国社会学即群学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构建了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树立了文化自信，也为中西文化、中西社会学更深层次的融合和会通提供了基础。这是结合我们的具体国情，从文化和实践中总结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典范。中国社会学如果只是按照西方社会学的路子走下去，或许能够发展、能够壮大，但想要实现真正崛起则很难。要想实现社会学的真正崛起，一如景天魁的断言：“所谓‘崛起’，必须有自己的概念、命题和学术体系，必须有自己的特质，有自己的特长和优势，要么能够弥补西方社会学的重大不足，要么能够彰显新的视野、开辟新的领域、回答和解决西方社会学未能解决或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② 这便是确立群学这一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重要价值意义。

四、探索中国社会学史新观念的现实意义

（一）对“文化自信”应然状态的填补

文化自信的建设不是喊两句口号，我们说自信就真的自信了。文化自信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朝向未来的期许、期待，而非一种既成事实：我们有良好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积淀，有良好的制度与社会发展，有信心把文化建设好、发展好来有效应对内外诸多问题。^③ 也就是说，文化自信是一种应然而不是

① 参见陈光金：《中国社会学前沿报告》，《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7年第2期，第67页。

② 景天魁：《论群学复兴——从严复“心结”说起》，《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5期，第17页。

③ 参见沈江平：《文化自信构建中的四重关系审思》，《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237页。

实然状态。文化自信的应然，需要实实在在的文化研究成果来奠定。从这个角度来看，景天魁版的《中国社会学史》就是对文化自信应然状态的填补。应然的文化自信促使新型中国社会学观念的形成，新型中国社会学观念的确立反过来又巩固了我们已有的文化自信。除了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都需要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就如同夯土一样把我们的文化之料筑成自信之基。

“文化自信，立基于文化自知之上。由认知、理解而认同、确信，是文化自信生成、强化的基本进路。”^①只有对我们自己的文化有清晰的认知、理解，才能达到认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豪感，进而确立我们的文化自信，最终达到文化自觉。基于我们的历史文化背景，从我们的文化源头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就是我们中国社会学人的文化自觉，我们要用这一部分文化自觉唤醒更大的文化自觉。当文化自觉成为一种惯性，当中国文化从我们每个人的心底流淌出来时，我们的文化自信才真正建成。这个过程必定不是短期就能达到的，文化自信的建设需要像景天魁版的《中国社会学史》这样基于我们自身特质生发出来的文化之土，一点一点地累积起来，才能筑成我们的九层之台。

（二）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回应

我们一直在讲社会学本土化，但是现在有一个本土化误区，以为建构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社会学就是全面否定西方社会学。这完全是一种心理上的错觉和对社会学本土化的误解。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并不是否定社会学的多元性，而是说我们应当承继好我们的文化，利用好我们的传统资源，然后从中生发出基于我们文化背景的符合我们国情、我们经验、我们特色的社会学。寻求与中国学术传统的接续，只是为了纠正我们在社会学中对自己文化的偏见和忽视。当下的社会学传统和解释体系是以西方文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用来解释中国文化显然力所不逮。这是由东西方文明的底色决定的，也是西方社会学的局限所在。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我们每个社会学人都能切身感受到，只不过受旧有社会学观念的影响，有的人不愿意正视甚至否定这种差别，或者看到了差别却无能为力。其实，只要我们承认东西方文明的差别，承认东西方文化底色的不同，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离开本土文化谈社会学的本土化，很难实现真正的本土化。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土壤上具有不完全的适应性，这就为本土化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中西方文化在本质上的不同，是导致中国社会学界出现长达百年本土化议题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学界呼吁社会学的变革，呼吁社会学的新观念，虽然有时代因素，

^① 沈壮海：《论文化自信》，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29页。

但根本上还是由文化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国文化中产生景天魁版的《中国社会学史》只是时间问题。

（三）为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探索了新途径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化自信不是自娱自乐，而是需要与他者文化交流切磋、对话争鸣才能检验我们是否自信。从景天魁版的《中国社会学史》的产生来看，这种检验便是借西方社会学之石，攻中国社会学之玉。在建设我们自己的社会学时，应当欢迎来自各方人士的对话、批评、论争，从而产生文化上的交流，以促进中国社会学的建设。恰如贺雪峰所言：“中国社会科学应以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为目标，基于中国经验与实践，借鉴古今中外一切理论与方法，再回到中国经验与实践中去检验。”^① 借鉴古今中外，就是为了产生文化的融合与碰撞，从而激发、树立并完善我们自己社会学的过程。景天魁在中国社会学史论中提出“古今贯通”和“中西会通”这两个途径，便是在强调景版《中国社会学史》及其所确立的新型中国社会学观念并非在排斥西方社会学，恰恰相反，是为了更好地“借鉴古今中外”探索中国社会学的新形态。

我们常说走向世界，在社会学本土化思潮中，有学者将“全球化视为是一国社会学发展的奋斗目标”。^② 其实，只要我们能够建立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性的社会学，只要我们愿意、主动与他者文化交流、碰撞，产生对话、论辩、研究，这个过程便是在走向世界、影响世界，我们的价值观念就自然会构成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一部分或者占更多份额。^③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正如周晓虹在阐述社会学本土化时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真能够通过对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以及当下独特的转型实践的研究，赋予社会学以鲜明的中国性格，然后才能最终有资格参与全球社会学的话语分享，消解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学长期以来的话语霸权，建立一种多语境的全球社会学。^④

（责任编辑：温莹莹）

① 贺雪峰：《本土化与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兼与谢宇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第83页。

② 郑杭生：《社会学本土化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47页。

③ 参见葛剑雄：《中国需要怎样的文化自信？》，《文史天地》2021年第1期，第1页。

④ 参见周晓虹：《社会学的中国化：发轫、延续与重启》，《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82页。